钟楼街商贸金融追溯

孟 南

一座城市，伴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发展，商贸活动的行业行当及其规模也与城市的结构相对应——“城垣与市场”分置、“庙会与集市”合一、“前店与后坊”贯通，甚至包括以行业行当、字号称谓命名街巷等等，堪称是中国商业文化传统。这一方面，太原城也不例外。长此以往，太原的城垣格局进一步延伸出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及至当代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钟楼街的商贸

从唐明镇，到宋城，及至金元时期，再到明代、清代、民国，太原城的商人、商家字号、行业行当等等，很难给出较为准确的“真面目”，但依据城垣、庙宇、集市、街巷名称，以及传世久远的著名小吃等，却也能大体地描绘出太原城商贸及其民众日常生活的演进轨迹和图画：

宋城时期，整体的生产与消费水平有限，太原城的商贸自然以当时的寿宁寺（打钟寺）、唐明寺为中心，抑或联通东西的大东门街业已成为了商贸中心，但规模未必很大。从民国时期保留着宋代风貌的几十条小巷中，可以看到端倪，每一小巷朝着大街的出口处，均修筑有“阁门”，而四坊之一的“聚货坊”，俨然最初的专门区域。

金元时期的商贸遗存，风格独特，轨迹也清晰，除了适应草原民族风味饮食的“清真”之外，“海子（边）”原本就是蒙古语的音译，类似的地名和街巷还有很多，伴随着宋城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延伸，即便现在，具有草原民族文化特征的商贸踪迹也不难寻觅。

明代，自从晋王封驻，特别是“大钟楼”的修筑，标志着钟楼街的商贸地位正式确立。尤其是以钟楼街为轴线的寺庙一字排开：唐明寺—寿宁寺—开化寺—泰山庙，以及东西关帝庙（关侯庙）的重新修筑，“庙宇与集市”的相结合，钟楼街不仅仅成为了日用百货的聚散地，也成为了娱乐文化的场所，每逢过时过节，人头攒动、吆喝声不绝。如此盛况、情景，至少历时四五百年。桥头街和柳巷，原本就是文瀛湖的岸畔，缓解钟楼街拥挤的同时，更因为风景优美而吸引商贩及游人，与钟楼街形成了有机的商贸体系。

明中叶以后，专门开展与草原商品贸易的大南门定期集市兴起，是太原商业史上的又一个时代性标志节点，但到了嘉靖年间“鞑靼南下”，太原城深受威胁，城垣砖墙包筑的同时，城与市阶段性分离升级，类似的“卫星城堡”——大南关、东关、西关等，环绕拱卫太原。好在时间不长，在朝的山西籍官员王崇古、张四维等力主“隆庆议和”，紧张的局势结束，新一轮的太原商贸出现：一方面，草原物品大量南来，另一方面，城市移民中商人占据主流，太原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继续向东南北三个方向拓展，恰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商业化进程中的第一次浪潮。这一次浪潮中太原城引领商贸与城市发展的历史潮流，山西商人也因此而享有盛名、行商天下。

太原商贸的迅猛发展势头，虽然在晚清时期略有放缓，远不及沿海城市，但其传统的商贸习惯法——合伙制制度机制，却一直保持到抗战爆发，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

至于千百年来曾经出现在太原的商人、商家字号，兴衰更迭，委实难以知晓，需要更多的考证。目前所能知道的商贸遗存，更多地集中在民国后期，及公私合营时。

钟楼街的金融

再来说说以钟楼街为依托的货币与金融。

明初的太原是西北重镇，有明一代与蒙元对峙的“九边”占其一，军事功能格外突出，明中叶时期的“土木之变”“鞑靼南下”，及其在山西的长城修筑，曾经极大地影响了太原城的历史轨迹。晚明时期和明清转换之际，满汉关系新局面来临，蒙汉民族的商贸活动，尤其是“宣大议和”和“满蒙结盟”的连锁效应，以及“九边军屯”和“长城移民”，再一次直接地推动了太原商贸的发展：

以太原为中心的汾河谷地的商人群体，异军突起，行商天下，习惯上称之为“晋商”，而晚明前清时期的太原则是晋商的前进基地和枢纽。

商贸依托金融，金融服务商贸，商贸与金融相得益彰，堪称是明清晋商与草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智慧结晶，不仅孕育了以商业基础为依托的“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进而还演绎了从康乾时期发轫、嘉道成熟、晚清辉煌、民国初消失，执华夏货币金融之牛耳的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和脉络——山西典当、账局、银号、印局、镖局等等，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太原府辖县域的山西商人，将在草原及恰克图贸易中形成的市场化模式的制度性创举——春夏秋冬标期，落地在汾河谷地，标标准准的明清中国的“金融市场”。一方面，货币金融维护并促进山西商人的商业民间习惯法愈臻成熟完善，另一方面则培育并彰显着既普遍又有特色的货币金融思想——整个山西地区的货币形态和金融体系自成一体，货币形态、供给和平衡及其金融结构和创新思想，言之为“最具特色的东方中国货币金融道路”，丝毫不为过。

民国时期山西省银行伍圓本币上的太原钟楼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账局、钱庄的聚集地——太原钟楼街，到了民国初期成为“金融中心”，占据太原货币金融市场90%、辐射全省范围的山西省银行、银号、金融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各类、各级行号，应有尽有，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一区域，并且以此为“调度中心”，包括花花绿绿的纸币票据，也由此而飘飞三晋大地。1928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山西省银行曾经将“太原钟楼”作为图案，印制在“伍圓”本币上，全省流通，或许有一些伴随着中原大战，流通于整个华北地区。最近20年来，伴随着文物收藏和文物市场的活跃，学者以及地方文化爱好者藉此整理“无形之手的体系结构”，民国时期金融组织机构的准确称谓和资金情形及其金融运作方式，愈来愈清晰。这些有力地证明：太原城商贸的金融升级、飞跃性变革，太原钟楼街依然是中心。

占据特有地势的太原，从宋开启的城市化道路，世代更替，独具特色。除了汉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直接交流交往交融和链接之外，传统文化始终为主流，钟楼街文化堪称基因。在政治、经济、宗教、民生、军事等等方面，多维一体，有机构成；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由原点和中心次第拓展、逐渐延伸；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交互并行、相得益彰。历时千年，曲折演进。新的时代、新的契机，“锦绣太原城”建设更上一层楼，作为历史文化地标的钟楼街，历史地回归——千年古街，以人为本。

曹操马超潼关之战

李广洁

公元208年，曹操兵败赤壁，南进受阻。曹操将下一步军事目标选在西北。当时的西北地区，有马超、韩遂等地方军阀，各据一方，互不统属。这些军阀在形式上是归顺朝廷的，但总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曹操要征讨这些西北军阀，总得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于是，曹操想出了经过西北军阀的地盘征讨汉中张鲁的策略，他料定这些人会起兵抗拒，这样他对西北用兵就师出有名了。

211年农历三月，曹操让坐镇长安的钟繇征讨张鲁，派夏侯渊从河东出兵与钟繇汇合。这样，夏侯渊的部队就要经过关西诸将的地盘。马超、韩遂等人怀疑曹操的真正意图是针对他们，便联合各路，聚众十万据守潼关，阻止曹军进入关中。曹操派曹仁率军与关西大军在潼关相持数月。八月，曹操率领的援军经过函谷关西进，到达潼关。

汉代的潼关城还不像后来紧靠黄河边，而在今潼关附近的城北村、杨家庄一带，关城东西两边都是深沟，形势十分险要。马超、韩遂等人率领的关西兵又特别骁勇善战，曹操的大军想攻克潼关天险，可能性几乎为零。

曹军摆出强攻潼关的态势，十万关西联军被牢牢地吸引在潼关附近。当时各路军阀不断增兵，每当听说又有一支部队到达潼关，曹操就面露喜色。部下问其故，曹操解释说：“关中地域辽阔，如果敌人各自依着险要之地防守，就算我们出兵攻打，没有一二年是难以平定的。现今他们全部来集结，人数虽多，但互相都不归服，联军没有一个统领，我们便可以一举消灭他们，所以我感到高兴。”

双方相持多日，曹操估算关西所有兵力都已集中到潼关，便采纳大将徐晃（今山西洪洞人）的建议，派徐晃、朱灵率4000人从蒲坂渡口（今永济市蒲州西）过黄河，在河西扎营，以便接应大军由河东进入河西。

徐晃在蒲坂西渡成功，曹操指挥大军从潼关附近的渡口渡河北上，曹操和许褚等精锐百余人留在南岸负责断后。马超见状，立即率一万多人追击，众箭齐发。曹操的船夫被射死，许褚左手举着马鞍为曹操挡箭，右手拼命划船，十分狼狈。

马超判断曹操想从蒲坂津西渡，便派梁兴带5000多人前去抢占河西的渡口，阻挡曹操大军西渡。没想到曹操用兵技高一筹，梁兴的5000多人赶到蒲坂津对岸时，遭到以逸待劳的徐晃打击。曹操的大军从蒲坂渡口源源不断地西渡黄河，后来部队的粮草都通过蒲坂渡口供应，史称“军食一仰河东”，蒲坂渡口成为曹操大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到战争结束时，剩余的军粮还有两千多万斤。

九月，曹操大军渡过渭河，在渭南安营扎寨，已经迂回到关西联军的背后。关西联军此时也从潼关移师渭南，马超等关西将领多次挑战，曹操下令坚壁不出。

关西十万大军从三月开始就聚集在潼关，长达半年之久，疲惫不堪。此时冬季将临，形势对关西联军越来越不利，无力再与曹军相持下去了。于是关西联军请和。曹操的谋士贾诩认为可以假装答应他们，曹操问他有何计策，贾诩说：“离间他们就可以了。”曹操明白他的意思，便应允联军的请求。

韩遂作为联军的代表与曹操相见。曹操与韩遂有过交往，当二人在阵前会面时，曹操并不谈军事，只说当年在京城的旧事，拍手欢笑。会面结束后，马超等问韩遂：“曹公说了什么？”韩遂却回答：“没有什么。”马超等对韩遂的态度十分怀疑，担心他与曹操私下联系。过了几天，曹操派人给韩遂送来一封书信，信中故意在几处涂涂抹抹，改来改去，就像是韩遂改动的一样，这就更增加了马超等将领的疑心。

离间计实施完毕，曹操立即与马超、韩遂等约期会战。联军大败，韩遂、马超等败走凉州。

在这次战役中，蒲坂虽然没有作为战场发生激战，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曹军在此役取胜，徐晃的4000人马成功地从蒲坂西渡是一个关键环节。曹操的数万大军先从潼关渡河北上，再从蒲坂西渡进入黄河之西，搞了一个漂亮的大迂回作战，战略部署堪称完美。在大军过河之后，蒲坂渡口又成为繁忙的军需运输码头，源源不断地将河东地区的粮草运往大军所在的渭南地区，确保前线作战无粮草之忧。

蒲坂和潼关的战略关系密切，作为长安的东部屏障，分别从水路和陆路扼守要冲，如果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在防守或进攻中顾此失彼，都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甚至是全盘皆输。曹操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在这次战役中，把潼关和蒲坂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到位，把蒲坂渡口的战略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黄河战事

山西辣

卫 平

每到秋冬，晋北一带辣椒之乡的农家屋檐下都会挂起一串串、一排排的辣椒，那红艳艳的颜色像用胭脂染过一般，鲜灼欲滴，从老远的地方便能望见。而望见这艳丽的辣椒，便会立即生涎引起食欲。他们爱吃辣椒是出了名的，每餐必有辣椒调味。在腌菜、炒菜、面食中，非放足辣椒不可。

特别是晋南人嗜辣如命，那更是出了名的。

晋南一带（尤其是运城）老百姓有一句口头语：“光吃辣椒不吃菜，凳子不坐蹲起来。”这大约是当地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以辣椒代替菜，或者说是把辣椒当菜吃，已经习以为常了。炒着吃，调着吃，蘸着吃……晋南人的饭桌上，终年不缺辣椒，而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做成油泼辣子。

油泼辣子的做法很有讲究。油的火候很难掌握，油温低了泼出来的辣子香味不够，还很辣口；温度过高把辣椒面烧糊了，食用时有苦苦的味道，且色泽发黑。只有把油加热到微微冒烟，油泼辣面时“滋啦”冒泡，火候才恰到好处，泼出来的辣子，辣而不燥，色、泽、味具佳，使人食欲大开。

油泼辣子夹馍，那是多少晋南人魂牵梦萦、深深烙印在骨子里的味道。

把大白馒头掰成两半，两边蘸上油泼辣子，再合到一起，猛地咬下一个“半月”，面香与辣椒混合在一起，越辣，越要用馒头止辣，但紧接着更猛烈的一波辣感来袭，让你不得不再次狠狠地咬下一口，如此往复，不断刺激着你的味蕾，简直让你欲罢不能！这就是运城人常说的“油泼辣椒美太太”，真是一种享受。

炒菜时，山西人在许多菜肴里也要适量地放些辣椒，以增进或刺激食欲，调节口味。当然，在辣椒收获的季节里，一些人把刚摘取的辣椒在身上一擦，当菜生吃。绿油油，红亮亮，一口下去，脸通红，眼里出泪，舌头又麻又似针扎，像喝了开水似的烫，这叫生辣！

还有老虎菜。把摘下的辣椒洗洗剁了，红辣椒、青辣椒，有的还放洋葱、蒜苗、葱、蒜、香菜，一起拌了，刚入口清凉，但还没等你享受这清凉片刻，马上“火山爆发”了，无边的辣似火焰般席卷全身，赶紧再夹一筷子，用那短暂的清凉来降下这猛烈的火，但接着就是更猛烈的辣袭来，让你不断地体验冰火两重天，没有吃过的人是万万体会不到的，这就又是一种吃法了。

还有烤辣椒，有巴掌大小的辣椒，绿油油的，用铁丝串了，放在火上烤。这是个技术活，你得会烤，来回不停地转。时间短了不行，生的，没有烤出来香味；时间长了不行，烤焦了，吃着发苦。掌握好时间，烤出来的辣椒才香气逼人。

山西人对醋的喜爱，天下无出其右者，但是，这并不代表山西人就不能吃辣椒。

山西是鲜椒和干椒混合种植的大省，品种多样化，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其主流品种，而且近几年的种植面积也是在逐步增加。

朔州的应县、长治的长子县是国内著名的青椒生产大县，被誉为“中国青椒之乡”。这里产的青椒以其个大肉厚、色泽鲜艳、耐藏易运的独特品质备受客商和消费者的青睐，生吃可当水果，烹、炒、煎、炸、煮、蒸、拌馅、腌渍食之，香美可口，加工成青椒酱常年尝鲜，已成为闻名海内外的重要地理标志特色产品。

朝天椒在山西主要分布在临汾襄汾县南部赵康镇。赵康辣椒形美味浓，果皮油亮，色泽深红，辣中有香，香中有甜，综合品质极好，属椒中佳品，营养价值很高。

大辣椒主要品种是北京红、二荆条、杂交线椒等，加工型产品，主要用来做辣椒粉。忻州是国内大辣椒的主产区，这里还是华北主要的辣椒种子繁育基地。

代县种植辣椒的历史悠久，精心培植起的羊角辣椒，质细、色红、皮厚、肉嫩、籽少、味辣、油性大，实为调味佳品。代县辣椒因有尖、小、辣的特点，所以用药最好。少量服用，可促进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外用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能治疗冻伤、风湿痛、腰肌疼痛、关节疼等；内服适用胃弱、消化不良、肠胃充气、胃痛等。

晋城市陵川县种植了一种色素辣椒，从这种辣椒中提取的红色素，是一种天然的着色剂，主要着色成分为辣椒红素和辣椒玉红素，属类胡萝卜素，占总量的50%至60%。提取的红色素色泽艳丽、着色力强，主要应用于高档商品、化妆品和制药等领域。

对面食有着独特见解的山西人，对于辣椒，也有着独特的情怀。

葸理和踅歇

张玉虎

“葸理”和“踅歇”，太原城南农村老方言中的这两个词，由于当今讲普通话的人们很少使用，有些人便以为是两个土得掉渣的词，是两个没有文化含量的词。其实，细细考来，太原土话中的这两个词，不但不土，而且是有根有底的文言词。

先说葸理。葸理（qili）在太原方言中，其词义近似于现在普通话语境中的修理，但又宽泛，它还含有普通话里整理、清理、处理等这些带“理”字的词的意思。农民以种田为生，好些词儿都能在田间地头使用，谷子、豆子等庄稼地里草盛苗弱，需要锄草助苗时；或者黄瓜、西红柿等菜蔬旁枝太多影响了结果，需要打掐冗枝时，农民口里多用“葸理”一词。人们下地劳动使用的农具或者出行的自行车、家里的家具坏了，自己不会修理，也会请个师傅来葸理葸理。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基本上收拾屋子的事情，全归家庭主妇，家里的男人和孩子们不动手收拾，看到屋内被孩子们折腾得零乱不堪时，女人们就会头疼地说：“唉！这窝舍怎地也葸理不出来。”男孩们在家里捣蛋得厉害，当妈的管不住时，就会诈唬道：“等你老子回来葸理你的。”

若考葸理一词的来处，则至少可推到汉代，《后汉书》雷义传中就有“后葸理屋宇，乃得之”这样的句子。五代杨凝式《赠张全义》诗云：“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葸理，至今犹是一堆灰。”宋代苏轼《论给田募役状》中有“应募人交业，承佃后，给假半年，令葸理田业”。可见，葸理一词在古代文人中是个常用词。现代的普通话中虽然少用，却在我们的方言中保留下来了。

再说踅歇（diexie）。老方言中踅歇一词的意思，是指在走路或者劳动的过程中，稍事休息，缓一缓劲儿，恢复恢复体力，然后再继续前进或劳动。这个词现在也只存在于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口中了。

目前，我查不出踅歇这个词，也没有查阅到含有这个词的古代文献。但“踅”字是一个在古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它的意思是走路不稳或走路时忽然后退。用“踅”字组成的词有“踅蹉”和“踅踱”。踅蹉的意思是走路时跌跌冲冲。汉代焦赣《易林·蒙之暌》中有“踅蹉侧跌，申酉为祟”。踅踱的意思是走路时忽进忽退。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医术》一文中有“韩思不治则去此莫适，而治之诚无术。往复踅踱，以手搓体”。我们城南方言中的“踅歇”一词，虽然不见于古代典籍，但其构词方式与“踅踱”和“踅蹉”相同，且在我们方言区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也年湮代远了，也应属于“踅”字词组中一位古老的成员。说它是一个古老的文言词，也不为过。

晋方言

洪洞何以为洪洞

杨 毅

现在的洪洞县是1954年4月9日由政务院批准将原洪洞、赵城两县合并后形成的。当时曾按惯例取两县名字首字，命名为洪赵县，到1958年又改为洪洞县，这样改的目的可能是考虑到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历史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和亿万移民后裔对故土的情感，所以才特意保留了“洪洞”这一历史文化品牌。

原洪洞县在西周初称“杨”，因古代杨人生息于此而得名。西周金文的“杨”字形如人举着武器向太阳舞蹈的样子，专家由此推测，古杨人是一个崇祀太阳神的部族。西周初，封周文王庶子伯侨于此，为杨侯（另有周宣王之子尚父封杨之说）。据史家考证，古杨人于西周从这里向南方迁徙，辗转至今湖北房县杨子山附近，建杨子国，南齐在此置杨子县。后又东迁至江苏一带，留下扬州、扬子江等有关地名。在长江下游又与越人杂居，形成了春秋时期的扬越。战国时，扬越人的活动已达岭南，广州市神话传说有五位仙人持谷穗骑五羊创建五羊城的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扬越人开发广州的历史反映。

如此来说，早在三千年前洪洞县境已经开始移民了，而且比明初移民的范围更远更广。再说伯侨为杨侯，子孙世袭达四五百年，晋献公时将杨侯国灭掉，后封晋悼公之弟于杨，号曰杨干。晋平公时，杨又成为叔向的采邑，叔向子羊舌伯石以邑为氏，改姓杨氏。汉代学者扬雄在自叙家世时说：“叔向食采杨氏，生伯石，字食我，以邑为氏。”说明洪洞还是杨姓的发祥地，且古代“杨”“扬”二字通用，杨、扬两姓同出一祖。春秋末，晋国私家势力逐渐壮大，并不断对羊舌、祁等旧贵族发起进攻。公元前514年，新兴势力灭羊舌氏，将其采邑分为杨氏、平阳、铜鞮三县，以僚安为杨氏县大夫。这是洪洞县境内最早的置县。西汉在此置杨县，县址在今洪洞县东古村（一说在东南范村）。

东魏时出于战争需要，在杨县北25里建屯兵城堡“洪洞戍”，也称“洪洞镇”，洪洞之名从此出现。古籍中对此地名也有记载，如姚最《序行记》：“周建德五年，从行讨齐师，次洪洞，百雉相临，四周重复，控据要险，城主张元静率其所部，肉袒军门请降。”再如《北史》：“周主至晋州，宇文宪自雀鼠攻拔洪洞。”这些史料中的“洪洞”皆指军事要塞洪洞镇，其位置在今洪洞县上纪略一带。

隋义宁元年（617），李渊起兵太原，南下霍邑，经过杨县时，因恶其县名与隋帝姓氏同为“杨”，遂改杨县为洪洞县。

说到洪洞的含义，地方志记载是，因城南有上古传说中的仙人洪崖所居住的“洪崖古洞”而得名，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牵强。记得郝树侯先生谈到过他的见解，他认为：“洪是大水，洞是疾流，因为这个地方靠近汾河，形容它波涛澎湃。”对此，很多人表示赞同。在古籍中“洪洞”又作“鸿洞”，原意确是形容大水，如《淮南子·原道》：“（水）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有时也形容大风，如汉代王子渊《洞箫赋》：“风鸿洞而不绝。”我认为东魏在此设军镇，建洪洞戍，还应该有以洪波之势显扬军威的意味。

洪洞县北为原赵城县，“赵城”的来历也颇为悠久。西周时，周穆王有一位得力的驾车手，叫造父，相传周穆王西巡，由造父驾良马八匹直趋昆仑，见到西王母后听说徐偃王谋反，又与周穆王日驰千里，东归击徐，大破叛军，造父以此军功受封赵城。“赵”的本意是超速疾行，“赵城”这个地名就是以造父日驰千里平徐偃王的功绩而命名的。造父的后裔便以赵为氏，尊赵城为其发祥地。

原赵城县境从汉至隋历属彘县、永安县、霍邑县，隋义宁元年（617），始分出赵城县，直到1954年与洪洞县合并。

洪洞县临霍岳，带汾水，得山川劲气，民性刚毅，风土质朴，故谓“洪洞”，嘉名非此地不可当也。